

国际贸易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探讨

——基于有为政府与国内外市场扩展视角

佟家栋

摘要：在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培育、成长和发展中，有为政府和不断发展的市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启动了中国以轻纺织工业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融入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加入全球产业链，追赶和紧跟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进而正在蓬勃发展的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和新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国实现了工业革命的跟跑、并跑和部分领跑，成为全球制造业部门最齐全的制造业大国。在此过程中，有为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经济的工业化与市场化是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立和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和出发点。

关键词：有为政府；产业革命；市场化；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 F7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2026)01-0010-11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跟四次产业革命的步伐，成为制造业大国，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树立了榜样，开辟了道路。在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创新体系的建立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府的作用；二是中国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大规模扩展。在国际贸易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中，这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以致成为开放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支柱。

一、中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与有为政府的作用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爱国者和仁人志士不断探索中国振兴之路，从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到民国争取关税自主，保护本国近代制造业，再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的设计，构成了振兴中华的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努力，为后来中国

[收稿日期] 2025-12-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自贸区、自贸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研究”(20ZDA052)

[作者信息] 佟家栋：南开大学讲席教授，电子邮箱 985016@nankai.edu.cn

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真正启动中国工业革命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激活了人们对产品以及对商品市场的需求。

1978 年底，安徽小岗村 18 户农民秘密签订“大包干”协议，将土地分包到户，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党中央关注到农民自发行动的合理性，认识到激励机制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其关键是农户在完成国家任务和集体提留后，剩余产品与收入全部归己，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归农户自己最为关键。在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所有农产品的剩余部分都归地主所有，并以租金的形式上缴，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越是没有积极性，农产品的生产率越是难以提高，从而落后的农业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更谈不上走工业化道路。

发展经济学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归结为“贫困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穷是因为其本来就穷，即贫穷是贫穷的原因(克鲁格曼，1998)^[1]。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主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和土地，在农业生产率有限的情况下，农业越是落后，越不能积累起资金购买先进的农业工具或机械，对人口出生的依赖程度越高。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越低，生产的剩余产品越少。即使有一些剩余产品，还被封建地主所占有，并没有提高生产率的直接愿望和动力。与此相对应，希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农民因为没有剩余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没有动力改良工具。因为即使提高了生产率，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也会因为交地租而失去。由于缺少提高生产率的激励机制(剩余产品的支配权)，中国农业总是处于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文一，2016)^[2]。

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是改变剩余农产品的支配权。如果这种支配权属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参与者，生产者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协议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通过延长在田间的劳动时间以及精耕细作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具体情况见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公有制条件下，经营方式的改革，特别是剩余产品支配权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如此，剩余产品的支配权还带来了农民对销售农产品市场的需求，售卖剩余农产品获得的收入，又提高了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等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农民对生活必需品、生产工具的需求，引发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农业对工业品需求的大规模增加又推动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由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经济”状态下积累的普遍而庞大的需求迅速爆发式的增长，这促成了工业品生产的规模化，且进一步增强了对工业品机器生产的广泛需求，推动了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兴起。由于当时中国有 10 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有 8 亿，占 78.9%)，井喷式的需求增长，使中国以纺织工业为代表的日用消费品的产量迅速增加，品种日趋多样化。第一次产业革命也迅速进入高潮期，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化社会的初步阶段。

表 1 中国 1979—1984 年农业总产值与增长率
(单位: 亿元, 按当年价格计算)

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可比价增长率(%)
1979	1 697. 6	7. 5
1980	1 922. 6	3. 9
1981	2 180. 6	6. 4
1982	2 383. 0	11. 3
1983	2 750. 0	7. 8
1984	3 214. 1	12. 3

注: 农业总产值包括农、林、牧、副、渔业; 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扣除价格因素), 反映实际产出变化。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从工业革命发生的条件来看, 还需要具备以下一系列条件: 第一, 一个交通比较发达的运输系统, 为商品的运输提供良好的交通配套设施, 从而降低运输成本; 第二, 一个商人阶层的存在, 他们收集消费者的需求和生产者的供给信息, 开拓市场并为市场网络的营造提供聚集场所; 第三, 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政府, 重视市场经济发展并制定支持市场发展的政策, 林毅夫教授称之为“有为政府”。关于运输条件, 纵观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 由于农业社会的封闭性, 这种运输条件常常是相对落后的(波斯坦等, 2002)^[3]。但是在中国, 特别是 1949 年以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灌溉系统)、公路和铁路运输的道路以及水路交通系统初步建设完成, 为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工业品下乡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 非常健全的农村人口管理系统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组建了乡村、乡镇和县三级机构, 为农村生产和市场行为的有效组织提供了基本架构。而且, 经过对十年“文革”的反思, 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统一的共识, 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要使人民富裕起来, 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即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 1994)^[4]。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 伴随着 1984 年开始的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收入不断增加的城市居民与初步富裕起来的农民一起, 形成了庞大的日用消费品市场。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洪流推动了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发展, 中国轻纺工业的发展引爆了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

纵观历史, 英国和美国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和条件几乎是相同的(曼昆, 1999^[5]; 米什金, 1998^[6])。他们的工业革命是农产品生产率的提升, 农产品的市场化, 然后是交通运输系统的逐步发展, 使商品市场逐步扩大。接着, 一个积累了商业资本的商人阶层慢慢成长起来, 并通过商业的经营, 不断组织、扩大商品销售的市场, 资本主义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在此过程中, 一个重商主义的政府促成了国内, 进而是国外市场的不断拓展。发生产业革命的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对企业开

拓市场都是给予坚决支持,这种支持,在历史上被称为重商主义。其表现为在国内出台各种法律和制度,推动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建立。在对外贸易上,主张出口限制进口,保持贸易收支顺差,培育、开拓和稳定外部日趋扩大的市场。而农产品商品化的不断扩大,促成了农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推动了对工业品生产的需求,特别是轻纺织工业品(日用消费品)的需求,进而引爆了以轻纺织工业为主的第一次产业革命。这种产业革命的必然结果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轻纺织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为机遇,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的占领、扩张和霸权。当然,英美两个国家的霸权是依靠一系列的战争来保障和拓展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与英国和美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有着鲜明的差异。中国产业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各层级的领导干部充当了其他国家需要漫长的积累和训练过程才能成长起来的商人阶层的角色,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坚决贯彻党的意志,本着领导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理念,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革命的道路。在此过程中,政府将分散的、对剩余农产品有支配权的小农经济细胞组合成敢于(利益驱动)进入商品市场的经营者,并形成了便利农产品销售的市场,且建立了运输成本比较低的商品销售网络,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以及对日用消费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等工业产品的旺盛需求。这种不断升级的良性循环,促发了以轻纺工业发展为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文一,2016)。

在考察中国经济工业化的起点时,必须强调,有为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和有效的组织。首先,提出改革开放是在经历十年“文革”,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之时,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将国家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决心带领全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自1949年起,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没有成熟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前苏联的经验与中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构建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运行体制,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也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经过17年的努力和“文化大革命”,尽管在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生产者的组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引发中国的工业革命。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总体上还缺乏对社会成员物质产品生产的激励机制和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农业生产的管理体制改革。1980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发〔1980〕75号),正式认可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提出“农户在完成国家任务和集体提留后,剩余产品与收入全部归己”,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韩保江,2023)^[7]。这种激励机制极大促进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坚持培育商品市场,借助需求的扩张刺激生产的增长,带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规模经济的形成,从而使以轻工业纺织品和生活日用消费品为主的制造业发育和成长起来。启动了中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其中,有为政府及其官员发挥的作用是中国产业革命发生和持续的关键。

因此,中国国际贸易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立的起点,应该是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兴起及对市场经济长期探讨后的自然引入。由此,引导中国广大人民认识市场、利用市场和开拓更广泛的国际市场,才是国际贸易“井喷式”发展的起点,也是将国际贸易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密切结合的起点。

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讲话时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而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引入中国经济运行之中,且这种市场不仅有国内市场,还很自然地延伸到国外市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外市场几乎是同时开放的。据统计,1978—199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154亿美元,年均增长12.2%。外商直接投资(FDI)从几乎为零增长到1990年的34.9亿美元,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第一产业占比从1978年的27.7%下降至1990年的26.6%,第二产业占比从47.7%下降至1990年的40.9%,第三产业占比从24.6%上升至32.5%。在出口产品中,轻工业产品占比提升最快,其中纺织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出口主力,1980年轻工业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达42%。

二、中国外部市场的特殊作用与产业革命的不断升级

中国产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升级源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既包括内部市场驱动的原因,更包含外部市场的迅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开启了中国原始产业革命后,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90年代又引爆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时,中国轻工业发展对生产机器的需求也迅速扩大,要求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通讯业迅速发展,以便满足市场对这些生产资料生产产业的需求。同时,中国工业品市场的扩大不是仅局限在国内,更重要的是国际市场的扩大和对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的无限扩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经济也逐步进入经济全球化的高潮期,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看来,经济全球化不仅有利于发达国家在全球配置资源,更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态势(Feenstra和魏尚进,2021)^[8]。因而跨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企业、营销场所布局在所有可能降低其生产和经营成本的国家 and 地区,这种态势就是以发达国家获取最大限度利润为主导的全球化分工合作体系进入二战后的高潮期。此时,中国经济开启了改革开放,这一变革在西方看来,就是向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靠拢。同时,中国产业革命升级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在不断迎合国内市场迅速扩展的需求,以致形成巨大规模市场。同时全球化和西方的欢迎,是这种市场成倍数扩张的表现。因而,在中国刚刚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就迎来了第二次产业革命。

然而,由于技术和资金的缺乏,市场的迅速扩展不仅体现在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的增加上,还引发了对资本要素的吸引力。首先,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廉价生活必需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巨大而迅速增长的需求推动下,中国将出口产品的需求进一步转化为对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需求。这样,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巨

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需求迅速增长的驱动下，中国廉价而吃苦耐劳的劳动力与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乃至与国外资本有机结合，生产出技术含量不亚于西方国家质量要求的日用消费品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次，中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出大量的重化工业产品，进一步点燃了中国第二次产业革命。

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市场经济的扩展中又发挥了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1980 年 8 月 26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这是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实行“三来一补”政策的重要起点和窗口。实际上，在中国发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同时，已经将开拓国际市场作为拓展中国工业化市场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使中国产业发展紧跟世界经济和工业革命的步伐，以致在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部分，或者说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循环之中，在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发展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中国都在不断追赶中紧紧跟上和补课。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能做到的。尽管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落后了，但是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在政府的支持和开放性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引进先进技术的工作。比如，在引进外资政策实施之后，中国政府又启动了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以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2015 年 5 月 19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 2025》，这是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 2025 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 2035 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涉及到的十个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今年是《中国制造 2025》战略规划第一步完成的时间。

据统计，中国进出口总额从 1990 年的 1 154 亿美元增长到 2000 年的 4 743 亿美元，年均增长 14.3%。FDI 从 1990 年的 34.9 亿美元激增至 2000 年的 407 亿美元，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 GDP 年均增长率达 10.3%（1991—2000 年）。第二产业占比从 1990 年的 40.9% 上升至 2000 年的 45.5%，其中制造业技术进步明显，机械电子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从 1990 年的 17% 提升至 2000 年的 33%。高技术产业初具规模，1995—2000 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年均增长 25%，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6% 提升至 15%。可以看到，外部市场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支持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中国外部市场的扩大和宽松，关系到中国四次产业革命的不断升级，而且是短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中国完成产业革命所花费的时间大大低于英国和美国。英国的

产业革命从 16 世纪起步到 19 世纪末真正统治世界,形成霸权,大约经历了三百年的时间。其中,英国和西班牙的战争(1585—1604 年)、英荷战争(1652—1763 年)、七年战争(战争击败法国,确立北美和印度殖民地优势)、拿破仑战争(1803—1815 年)、鸦片战争(1840—1842 年;1856—1860 年)、布尔战争(1899—1902 年),控制南非,巩固非洲殖民地,所有这些战争都是英国为扩张外部市场,带动自己的商品出口,从而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而发动的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沃勒斯坦,1998)^[9]。美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在其 240 多年的发展史中,除了 20 多年没有发生战争之外,美国都在发动或参与战争,甚至是主要参与者。这两个霸权国家在扩张和维护国际市场的进程中,发动了多次战争,从而大大延长了其崛起的时间。

而中国则不同,自 1978 年以来,中国没有因为要扩展外部市场而与任何国家发生市场的争夺战争。相反,中国工业革命的连续跨越,很大程度上是内部市场的扩张与外部市场的扩张几乎同时在和平的环境下到来,迅速扩张的市场需求,带动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快速追赶和发展,从而,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就赶上了世界产业革命的步伐。而且中国正走在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新生物技术、新能源开发与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路上,且成为某些战略产业激烈竞争的主要参加者。《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规划实际上勾画了产业发展的跟跑、并跑和领跑的战略设计和路径。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投资、贷款等政府行为,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资源办大事的重要作用。

三、融入全球价值链和生产链中的政府作用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高潮期。其基本依据是,跨国公司以最大限度的利润为追逐目标,将其子公司按照生产环节的可分割性与成本最低化原则,将原材料采购、零部件加工生产、产品装配、成品分销和售后服务分布在经营成本最小的国家或地区,从而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也是参与国际分工,进入以规模经济为目标的国际市场的过程。从而,企业就可以进入全球市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引进外资政策,一方面,使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之中。中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原材料、半成品和制成品的主要来源地。在 2000—2010 年期间,中国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基础工业品和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地。

从矿产与能源领域看,中国不断加强矿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在 2005 年,矿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3 075 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21%。同年 1—9 月,出口煤炭 4 807 万吨,同时进口大量原油(1.09 亿吨)和铁矿石(2.47 亿吨),体现了中国在全球资源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在化学工业方面,中国的化工工业经历了高速发展。以 PX(对二甲苯,重要化工原料)为例,其产量从无到有,在“十一五”期间产能迅速放大,到 2010 年达到 747 万吨,位居世界首位。到 2010 年,中国石化行业总产值达到 8.88 万亿元,仅

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化肥、农药、染料等多种化工产品产量也位居世界前列（李伟，2011）^[10]。

在汽车零部件领域，汽车零部件产业飞速发展。2000—2005 年，汽车零部件企业的销售收入年均增长高达 36.82%。更重要的是，在 2005 年，汽车零部件出口额达到 118.5 亿美元，首次超过进口额，实现了从净进口到净出口的历史性转折。跨国零部件巨头几乎全部在中国设立了合资或独资企业。到 2004 年，在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中，三资企业的数量占比已上升到 19.8%^①。

在作为装配与制造基地的建设中，跨国公司不仅将中国视为销售市场，更将其定位为面向全球的生产基地，进而在中国形成了产业聚集效应。其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带动了相关产业在中国形成集群。例如，在汽车产业，到 2008 年，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已聚集了 7 家整车企业和 160 多家零部件企业，累计投资总额超过 600 亿元人民币，致力于打造“中国车都”。

在产业链升级与战略方面，跨国公司的投资从早期的参股、合资，逐渐向控股、独资转变，并开始按最佳分工和布局整合在华企业。同时，他们将设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升级为战略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截至 2009 年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各类研发中心超过 1 200 家。此外，随着中国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惠普、英特尔等跨国公司也开始将工厂向重庆、成都等内陆城市转移，以寻求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贴近新兴市场^②。

同时，中国不仅成为原材料供应来源地、零部件生产和制造场所，还是全球采购来源地。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和工业品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网络，源源不断地进入世界市场，且规模巨大。在采购模式与要求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有其严格的标准和程序，通常会全面评估潜在供应商的品质保障体系、交货供应体系、环保认证体系等。虽然采购量巨大，但当时许多中国本土企业主要提供基础原材料，难以直接成为核心的“一级供应商”。这促使中国企业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技术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以适应全球供应链的要求。

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政府长期坚持开放政策，将开放的业绩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指标。一些积极促进经济开放的领导干部的晋升，成为政府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导向和信号。在政府支持下和具体环境的营造方面，除有为政府发挥了重要的核心作用之外，国际市场对中国的接纳和欢迎也构成了中国产业革命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原因。

四、国际贸易领域知识体系自主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有为政府在中国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农业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需要借助市场需求的激励。1978 年，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剩余产品支配权

①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信息网：沈宁吾“十五期间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回顾”。

②同上。

归生产者所有，推动了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这种激励机制使剩余产品成为农业商品，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唤醒了人民对农业商品和日用商品的庞大和广泛的需求。在政府让人民富裕起来的共同意志下，各级农村和城镇的干部，在努力做好业绩的驱动下，扮演着商人阶层的角色，推动农产品市场的扩大、乡镇企业的兴起，为原始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工业领域的改革，使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以满足民众需要为目标迸发出来的市场需求，引发了以轻纺织工业为主体的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由于中国是从“短缺经济”转型而来，积累起来的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对工业日用品的需求迅速增加，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特别迅猛。由于广大民众对物质生活富裕起来的渴望，凡是政府提出并认真执行的政策措施，希望尽快富裕起来的人民都毫不犹豫地紧紧跟随，政府政策给他们带来的物质产品供给的不断增加和由此带来的个人与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坚定了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政府官员们的“业绩锦标赛”，带来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共识。使中国经济发展和比较优势不断升级成为必然。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前 10 年，所有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促进本地区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好思想、好办法、好政策和好措施，都成为全国各区域学习和推广的经验。比如，中央推出“经济特区”，使这些特区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各地相继推出自己的省级、地区级、市级、甚至县级的发展经济的特殊区域。在中国政府推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战略举措后，各省、市、自治区及其下一级政府机构又想尽办法，出台相应的引进技术、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的政策措施。因此，在中国，从加入国际分工、开拓国际市场、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世界工厂，无不反映了中国的有为政府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对外贸易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发展过程和最终落脚点都离不开有为政府。在推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形成、国际分工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跃升中的战略设计、支持与投资、在转型升级和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中，也离不开有为政府。因此，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特殊性的根源在于，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是有为政府及其官员们带领全体人民完成了这一进程。

第二，中国国际贸易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培育、发展、宽松与自由。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政府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起和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为中国农村剩余产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点燃了中国以乡镇企业为依托的原始工业革命的星星之火，长期受“短缺经济”压抑的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需求以井喷式状态喷发出来。随后，开始了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并以市场换投资、换技术、换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了中国企业融入国际市场，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发育、成长，乃至成熟起来，成为全球价值链日趋壮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期间，这两个因素给中国带来了宽松的、

几乎无限接纳的国际市场。在西方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既然是朝着市场经济发展，就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有利于西方国家利益的，因此，凡是支持和拥抱全球化的国家，都是紧跟西方发展的，有利而无害。因此，中国获得了宽松和开放的国外商品市场。世界市场对中国各类制成品，特别是初期对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的迅速扩大，带来了中国人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随后的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不断跃升，特别是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展，激励了中国产业革命的升级。没有宽松和日益扩大的外部市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形成自己传统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世界工厂”，实现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和无人机等新三件为代表的新比较优势就不会顺利而迅速地实现。因此，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贸易结构不断改善、资本流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逐步形成可控的全球、区域和周边国家相互合作的价值链等等，都是在中国所获得的国际和国内大市场内实现的。没有这样一个宽松的市场，顺利而迅速发展经济贸易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成为全球制造业部门最为齐全的国家。

总而言之，在中国开放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中，必须将有为政府发挥的特殊作用放在首要地位，将中国在四次产业革命发育、成长、追赶和转型升级中所抓住的国内、国际市场的宽松放在突出的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来源于工业革命的顺利展开，来源于有为政府的英明领导，来源于全球商品贸易市场、要素流动市场的自由化、便利化和规范化。

2008 年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世界经济引向大国博弈和单边主义，使中国不得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中国 47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过程特别值得总结。有为政府的重要标准是，调动、激发人民参与的热情，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个人、企业能够在市场经济顺畅运行之中，获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就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 克鲁格曼. 国际经济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1 版, 1998.
- [2] 文一.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 [3] 波斯坦等. 剑桥欧洲经济史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文版) 第五卷, 2002.
-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M]. 人民出版社第一卷, 1994.
- [5] 曼昆. 经济学原理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1 版, 1999.
- [6] 米什金. 货币金融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1 版, 1998.
- [7] 韩保江.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性探索 [N]. 经济日报, 2023 年 7 月 4 日.
- [8] Feenstra, 魏尚进. 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 [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 [9] 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文版), 1998.
- [10] 李伟. 谁来制约工业化? [J]. 三联生活周刊, 2011, 35.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ac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TONG Jiadong

Abstract: In the cultivati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n open market economy, the proactive government and evolving markets—both domestic and the closely connected,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markets—have played crucial rol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icular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presented by the light and textile industries, was initia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propell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facilitated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rade system, and enabled China to integrate into global industrial chains. Subsequently, China caught up with and kept pace with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centered on 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and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driven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now actively engaging with the burgeoning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aracterized by big data, the Intern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energy, new materials, and new biotechnology. This journey has allowed China to transition from following and keeping pace with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leading in certain areas, establishing itself as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with the world's most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 sectors.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the role of the proactive government has been critical.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are the two major elements and starting points for establishing and shaping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s of China's open market economy.

Keywords: Proactive Government;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rketizatio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s

(责任编辑 王 瀛)